

简论元代的早逝

何泉达

[摘要] 疆域辽阔且在环宇之内鳌居强势地位的元朝，立朝之后一百年，即早逝于世界近代史的黎明时刻，其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找到激发古老资本走上“真正革命化的道路”；障目之叶，则是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弱化了社会个体的自强意志，对社会的淫逸习气纵风止燎，以至与本该励精图治而有作为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

[关键词] 元代；早逝；民本思想；淫逸之风

元代，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是一个强势王朝。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探讨它的兴衰存亡，不仅对研究历史本身显得必要，对“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① 同样具有意义。笔者不揣陋巷簞瓢，就此相关议题，弄匏于黄钟大吕之前，祈稀声大音振聩于嘈切之中。

蒙兀室韦：从氏族社会跃入封建社会

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脉，北界萨彦岭、肯特山、雅布洛诺夫山脉，南抵阴山山脉，包括今蒙古全部、俄罗斯南部和中国北部部分地区的这块古老台地，平均海拔 1580 米，地理学上称之“蒙古高原”。历史上，活跃于斯的主要是东胡^② 与突厥^③ 两大文化系统的渔猎和游牧民族。

蒙兀室韦^④，则是在这两大文化系统频繁冲突、交互征服过程中，脱颖于十三世纪，进而鸟瞰蒙古高原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其领袖忽必烈，更在 1271 年（宋咸淳七年），取《易

^① 《贞观政要》卷 2《任贤·魏征》，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407 页。

^② “东胡”一名最早见于《逸周书》，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因分布在匈奴（胡）以东而得名。公元前 209 年，匈奴冒顿单于杀父自立后，击败东胡，余部聚居乌桓山（现大兴安岭中部的东西罕山）和鲜卑山（可能即今大兴安岭北麓），形成后来的乌桓族与鲜卑族。从此，“东胡”之名消失于历史。

^③ “突厥”为居住中国古代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有广、狭二义：广义泛指突厥汗国以前和以后所有操突厥语的部落或民族；突厥汗国以后的回纥（回鹘），西迁的乌古斯等部也属于广义突厥。狭义指公元六世纪中叶到八世纪中叶在阿尔泰山南麓、漠北高原两度建立的突厥汗国，并活跃于中亚的民族。突厥的源流无定论，但一致认为突厥祖先姓阿史那、以狼为图腾。强盛时，势力所及，东至辽海，西抵咸海，北越贝加尔湖，南接阿姆河南。隋初裂为东西两部，至公元八世纪中叶退出我国历史舞台。

^④ “蒙兀室韦”，在汉籍文献中，自唐代以来，又有、蒙瓦室韦、篋劫子、梅古悉、漠葛失、忙豁勒、毛割石、蒙国斯、蒙古里、蒙兀部、蒙兀、萌骨、萌古国、蒙果勒国、蒙骨国、蒙古国等等称谓。自元代以来，方用“蒙古”二字固定下来。

经》“大哉乾元”^①之义，创建了“大元”王朝。^②

“‘大哉’，叹辞。”朱熹如是说。他且对“乾元”进一步注疏道：“‘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③

在朱熹看来，“天德”一判为元、亨、利、贞“四德”，且生息往复无止尽。他说：“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畅茂；利，则向于实也；贞，则实之成也。实之既成，则其根蒂脱落可复种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环而无端”。意在“圣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④

如此而已，元朝所以命名“元”，旨趣在祈望忽必烈开创的王朝，生息不止，太平永远。

《易经》意蕴向称古奥，文化积淀不深厚的民族欲吮而化之，非容易之举。但忽必烈拈来“元”字，将霸王事业绰立王朝之林，足见其运量《易》之微言大义的功力。那么，能以一“元”字命名一个新朝，是否在昭示世人，蒙兀室韦的文化底蕴，本来就水碧潭深？

《旧唐书·室韦传》，是我们迄今所见记载“蒙兀室韦”一名的最早文献。其中有几句可资索隐。文曰：

室韦，我唐有九部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居。

这些文字说明，蒙兀室韦迟至公元八世纪，尚生活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山深林密处。关于他们的社会形态，相关文献则作如下描述：

兵器有角弓楛矢，尤善射，时聚弋猎，事毕而散。其人士著，无赋敛。或为小室，以皮覆上，相聚而居，至数十百家。剡木为犁，不加金刃，人牵以种，不解用牛。夏多雾雨，冬多霜霰。畜宜犬豕，豢养而啖之，其皮用以为韦，男子女人通以为服。被发左衽，其家富者项著五色杂珠。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妇。役日已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武德中，献方物。贞观三年，遣使贡丰貂，自此朝贡不绝。^⑤

原来终唐之世，蒙兀室韦仍然保留着某种母系社会痕迹，至辽代前期，这种状态虽有改观，譬如已有“蒙果勒国”之称，但社会形态进步不大，依旧呈现一个散居部落的特质，势力也较小，且不跟在地域上与之共存的契丹国争战，惟以牛、羊等畜产品与契丹交易。更不被辽朝重视，至称之为“远蒙古国”。^⑥《契丹国志》说：

蒙果勒国，无君长所管，亦无耕种，以弋猎为业。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

^① 《周易集解》卷1，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页。

^② 《元史》卷7《世祖本纪》，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92页。

^③ 《原本周易本义》卷3《周易象上传》，“大哉乾元”句，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页。

^④ 《原本周易本义》卷3《周易象上传》，“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句，第12页。

^⑤ 《旧唐书》卷199《室韦传》，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71页。

^⑥ 《辽史》卷24《道宗纪》，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89页。

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来争战，惟以牛、羊、驼、马、皮、毳之物为交易。^①

但沿至辽代后期，从海都被“诸民”拥戴，“共立为君”，成为蒙古部首领开始，文化落后、社会形态原始的状态渐趋改观，所谓“形势寔大，列营帐于巴喇噶罕河（即八刺合黑河）上，跨河为梁，以便往来。由是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及发展到海都的第五代孙伊苏克依（即也速该），“国势愈盛大”。^② 而在此期间，由于“大金初起，尝假兵于蒙古。及其得国也，不偿元约，致彼有怨言”，^③ 终导致蒙古部对不守信义的金国边境，进行频繁的报复性骚扰。《松漠纪闻》记其事曰：

蒙果勒，其人长七、八尺，捕生麋鹿食之，金人尝获数辈至燕。……与金人隔一江，常度江之南为寇，御之则返，无如之何。^④

列宁有个思想：在特定意义上，“革命就是战争。”^⑤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⑥ 因为“革命能迅速地把人们团结起来，能迅速地使人们受到启发。”^⑦

前不久尚未脱尽血缘氏族社会气息的蒙兀室韦，此刻，经战争历练，则应刮目相看了。

首先，与蒙古交恶的金国，面对“益强”的“蒙古”，曾企图毕其功于一役而刈亡之，因此“将中原所教神臂弓弩手八万人讨蒙古”。^⑧ 不意“连年不能克，乃与之议和，割西平河（今克鲁伦河）以北二十七团寨与之。岁遗牛、羊、米、豆，且册其酋鄂罗贝勒（即熬罗孛极烈）为蒙辅国王。”然而，熬罗孛极烈“不受，自号大蒙古国，至是始和。岁遗甚厚。于是鄂罗贝勒自称‘祖元皇帝’，改元‘天兴’。”^⑨

此事纪在宋高宗绍兴五年至十七年，岁值公元 1135—1147 年，当十二世纪的中叶。而这整个十二世纪，恰属蒙古高原上诸部并立，不相统属，草原贵族集团之间，征战杀伐，攻略无宁日的时期。

这就是说，尝以“男先就女舍”的走婚乃至“无君长所管”的原始蒙古部，在有了一定发展后，适群雄争霸的历史大背景而积极参与，终经战争洗礼，快速迈入了人类文明的门槛，并且接受了国号、帝号、庙号之类的封建文化，从而构建“大蒙古国”、“祖元”、“天兴”这

^① 《钦定重订契丹国志》卷 22《州县载记》，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383 页。

^② 《元史》卷 1《太祖纪》，第 292 页。

^③ 《钦定重订大金国志》卷 9《纪年·熙宗孝成皇帝一》，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383 页。

^④ 《松漠纪闻》卷 1，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407 页。

^⑤ 《革命的日子》。《列宁全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93 页。

^⑥ 《革命的教训》。《列宁全集》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0 页。

^⑦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 11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9 页。

^⑧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55“绍兴十有六年”条，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327 页。

^⑨ 《资治通鉴后编》卷 116“绍兴十七年”条，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344 页。

些属于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

这是一种跨越社会形态发展常规的奇特现象，而推动和实现蒙兀室韦从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这一跃，正是战争。

其次，如果说熬罗孛极烈的“大蒙古国”，因为不见文献记载其曾经有过对封建国家机器的建设，所以权充它的“跨越”是社会发展常态中昙花一现的另类。那么，在经历十三翼之战^①、合兰真沙陀-折折运都山之战^②后的铁木真，于1206年“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游白旗，即皇帝位于鄂诺（嫩）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青吉斯（成吉思）皇帝’”，^③继而，于1211年始建“大蒙古国号”^④的举措，则不再是社会形态发展史上，由低级社会形态跳越式跨入高级社会形态所绽放的“昙花”了。它完全是对中原的封建政权形制之移花接木。有事实为证：

1213年10月，铁木真在“围燕京及引兵攻取河东北、山东诸州”^⑤后，“但居其故地，而于燕云置行省，命其大臣萨木哈领之”^⑥；

1222年5月，因“西域渐定”，铁木真开始对已掌控的各城，置“达鲁噶齐，华言掌印官”，以便“监治之”^⑦；

1226年12月，又定大蒙古国的算赋，“中原以户，西域以丁，蒙古以牛羊”^⑧。

试想，对诸如此类庶政纲纪的垦辟草莱，岂非一个血缘氏族社会酋领能够作为！

战争造就了成吉思汗，战争使他和他治辖的社会，快速进入了封建主义社会的轨道。

当然，战争是残酷的，任何一位善良人都深恶痛绝。所以，“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然而，“革命不是靠法律来实行[0]”，“在真正的历史上”，“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因为“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0]”^⑨因此，当战争一旦横亘面前，如果只见战争的血腥而害怕战争，躲避战争，反对战争，这不是有作为者应取的态度。

^① 十三翼之战是铁木真统一蒙古草原各部时的一次重要战役。发生于1190年。札答兰部首领札木合见铁木真领导的乞颜部日益强大，集合三万人进犯。铁木真将所属三万人分十三翼迎战。铁木真败，但因札木合残杀俘虏，引起属下不满而归附铁木真，铁木真军力因此得以迅速恢复和壮大。

^② 合兰真沙陀、折折运都山之战，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战中，与最强盛的部落集团克烈部王汗在合兰真沙陀（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北境）、折折运都山（今克鲁伦河上游之南）展开的战略决战。发生于1203年。王汗败在军情泄露和不设戒备。

^③ 《元史》卷1《太祖纪》，第292页。

^④ 《佛祖历代通载》卷21《大元》，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54页。按：治元史者大都将铁木真在1206年“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游白旗，即皇帝位”的史载，作为“大蒙古国”建立之始，因此把“大蒙古国号”之始系于这年。但缺乏依据。元释念常在至治三年（1323）受法于帝师帕克斯巴，有机会接触皇家典籍，所撰《佛祖历代通载》乃“据内典编年”。所以，该书说铁木真于“辛未（1211），大蒙古国号始建”，当可靠。笔者因此沿用。

^⑤ 《宋史全文》卷30“宁宗嘉定六年”条，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31页。

^⑥ 《两朝纲目备要》卷14“宁宗嘉定七年”条，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29页。

^⑦ 《元史记事本末》卷2《官制之定》，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53页。

^⑧ 《宋史记事本末》卷26《蒙古立国之制》，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95页。

^⑨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2、819页。

纵观历史，无数事实都在表达一个道理：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进步，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重大牺牲。铁木真不怕牺牲，他率领蒙古部驰骋疆场，在金戈铁马声中实现了历史跨越。

伟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大元：日出日没处“都是咱每的”

一个刚从原生态中走出的民族，通常不会被一时胜利拖累。所以，当“深沉有大略”的成吉思汗^①在统一蒙古高原诸部，使一个凡事“止是刻指以记之”^②的无文字部族有了文字，且“灭国四十”^③后，于临终前，不可能不为翦灭尚与自己对峙的金国再作战略布署。

1227年，成吉思汗“谕诸将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④

成吉思汗的来者实践先祖遗志，不仅在1234年春灭掉金国，更“举太山之势，以压宋卵”，^⑤于1279年统一中国，结束唐末、五代以来辽、宋、夏、金、吐蕃、大理等国长期并列和相互争夺局面，基本奠定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版图。其泱泱之盛，恰似秘书监臣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表现出的那番兴奋状：“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⑥

那么，在撑起“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⑦的封建主义大厦后，蒙古统治者直面滋长于这个大厦外壳下的文明时，昔日铁蹄响起，所向披靡的气势是否顿失？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揭示一条社会发展规律：不同文明的交锋，落后文明在军事上征服先进文明的同时，征服者在文化上“绝大多数”被被征服者所征服。^⑧

据以比较中国，在元朝立国前后，这一现象展开尤明显。略不同者，元朝统治集团并非被动地被被征服者所征服，而是在主动融合同时，又对先进于己的文明做了某种程度提升。

岂不，蒙古贵族先前占领中原北部时不得统治要领，但执政的现实教训他们“儒术有补治道”。^⑨于是四处“搜访人才”。太宗七年（1235），军克德安（今湖北安陆），获江汉先生

^① 《元史》卷1《太祖纪》，第292页。

^② 《六艺之一录》卷266《古今书体·蒙古国语》引[宋]孟珙《蒙古备录》语，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35页。

^③ 《御定渊鉴类函》卷40《帝王部·帝王总载二》，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83页。

^④ 《钦定续通典》卷94《兵·料敌制胜》，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页。

^⑤ 《弇州四部稿》卷110《文部·史论·文天祥》，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80页。

^⑥ 《秘书监志》卷4《纂修》，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96页。

^⑦ 《圭塘小藁》卷5《序·大一统志序》，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11页。

^⑧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9页。

^⑨ 《元史》卷125《高智耀传》第294页。

赵复，遂将其请至燕京，建太极书院，由他“讲授其中”。^①“学子、从者百余人”，忽必烈“在潜邸尝召见”。^②及忽必烈即位，“祖述变通”，^③果断施行“汉法”，^④代表封建文化核心的理学，因此得到重视。仁宗时，恢复科举，考试内容更“专以周、程、朱子之说”^⑤为宗，“海内之士，非程、朱之书不读”。^⑥理学自此成为官学。

但理学在昔日的自身发展过程中，曾发生朱熹与陆九渊兄弟在治学方法、学术意蕴方面的分歧，且终宋世而不得调和。两派异趣，明人顾炎武曾做过一个简括，他指出：

专务虚静，完养精神，此象山（即陆九渊）之定论也。主敬涵养，以立其本；读书穷理，以致其知；身体力行，以践其实；三者交修并尽，此朱子之定论也。^⑦

这就是说，陆学过于“空疏”，^⑧朱学过于“支离”。^⑨双方在治学路上各走极端。

及至元代，朱、陆之学出现打破门户，兼取各家所长新气象，理学家中除部分仍坚持朱、陆学统的门徒外，多数朱学中人纷纷摈弃朱熹格物穷理，“偏于言语训释”^⑩的烦琐，兼取陆学直识本心的“易简”方法。¹¹陆学中人则在坚持自求本心同时，兼取朱学的笃实“下学”工夫¹²和“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于理气之外”¹³的朱熹理气观。

因为撤了樊篱，朱、陆看对手，由攻诘而和会，促使理学在积极用世与内在发阐方面更进一步。因此有了许衡“治生”论；因此有了刘因返求六经和经史不分的思想。

前者使过去空谈性命的理学与实际有所接触。他的“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把“旁求妄进”、“作官嗜利”原因归之“生理不足”，¹⁴而非朱熹所谓利欲昏弊造成的观点，为明清时代进步思想家继承和发展。

后者是明清经学思想的滥觞。他的：“六经自火于秦”，故理学出自汉唐训诂，训诂又本于六经，后人架四书于六经之上，空谈心性，是颠倒博约关系¹⁵的表述，在当时不失清新。而“古无经史之分，诗、书、礼、春秋皆史”¹⁶的言论，又对王阳明经史“安有所谓异”^⑪、

^① 《元儒考略》卷1，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53页。

^② 《元史》卷189《儒学》，第295页。

^③ 《元文类》卷9《诏敕·即位诏》，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67页。

^④ 《元朝典故编年考》卷2《大儒时务书》，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5页。

^⑤ 《滋溪文稿》卷5《伊洛渊源录序》，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14页。

^⑥ 《圭斋文集》卷9《许先生神道碑》，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10页。

^⑦ 《日知录》卷18《朱子晚年定论》，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58页。

^⑧ 《黄氏日抄》卷34《晦庵先生文集·答陆子静书》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08页。

^⑨ 《黄氏日抄》卷68《蕪水心文集·敬亭后记》，第708页。

^⑩ 《道园学古录》卷44《吴公行状》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07页。

¹¹ 《象山集》卷25《诗·鹅湖和教授兄韵》，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6页。

¹² 《朱子五经语类》卷66《礼七·周礼二》，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3页。

¹³ 《师山遗文》卷3《跋太极图西铭解后》，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17页。

¹⁴ 《鲁斋遗书》卷13《通鉴》，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8页。

¹⁵ 《静修集续集》卷3《叙学》，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8页。

¹⁶ 《静修集续集》卷3《叙学》，第1198页。

章学诚“六经皆史”^②的观点，产生影响。

可以说，元代理学是宋代理学到明代理学的重要过渡；且开明清经世致用学理先河。

其实，蒙元定鼎中原后，由于不是简单地被征服者所征服，因此对先进文明的融合与提升，不局限在理学领域。他如史学、文学艺术、宗教、建筑和其他造型艺术等文化领域，都有很高成就。元曲是荦荦大者。

初，蒙古灭金，之后近八十年间，统治集团虽“遵用汉法”，^③却不行科举。这里不排除防止汉人过多进入统治层的意思，但很大程度还是对宋朝科举制泛滥成灾的反思。《元史·选举志》在这方面给出了很好说明：

宋大兴文治，专尚科目，虽当时得人为盛，而其弊遂至文体卑弱，士习委靡，识者病焉。^④

有鉴于此，对以科举进身是最光荣道路，通经读史，吟诗作赋，是本份的知识人，无疑沉重一击，致使有的归隐田园，有的跻身吏役，有的沦落街头插竹枝、提瓦罐。当然，也有不少知识人从读书做官道路转向勾栏，为艺人写杂剧、为被压迫者鸣不平。所谓“虽时不见用，志不获展，而于诗歌既能矣。”^⑤因此“感时抚事，形诸歌诗，以舒其忠愤之气。”^⑥

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说过：“愤怒出诗人。”^⑦已经驾蹇驴而无策的知识人，此刻，终于敢大胆抵牾儒家正统思想，用新眼光光顾通俗文学创作。钟嗣成在《录鬼簿》序中如是说：

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门者，吾党且啖蛤蜊，别与知味者道。^⑧

于是，一种雅俗共赏但更趋平民倾向的文艺新品种——元曲，创造性地诞生。

元曲包括散曲和戏曲。戏曲再分杂剧与南戏。其中散曲初称“街市小令”，^⑨也称“叶儿”。^⑩时称“乐府”或“今乐府”。¹¹它是继承宋金人词，并吸收民间俗曲和少数民族乐曲后形成。明人王世贞将此过程，作了以下概括：

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中国，所用北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¹²

^① 《王文成全书》卷1《语录一》，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65页。

^② 《文史通义》卷1《内篇一·易教上》，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1页。

^③ 《王忠文集》卷14《元列传二首·许衡传》，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26页。

^④ 《元史》卷81《选举志》，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93页。

^⑤ 《山窗余稿·章子渔诗稿序》，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18页。

^⑥ 《樗隐集》卷4《黄则行集杜诗句序》，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21页。

^⑦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90页。

^⑧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01页。

^⑨ 《中原音韵》卷下“拘肆语”，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96页。

^⑩ 《辍耕录》卷27《杂剧曲名》，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40页。

¹¹ 《辍耕录》卷8《作今乐府法》，第1040页。

¹² 《弇州四部稿》卷152《艺苑卮言附录一》，第1281页。

至于组成元曲的另一部分——戏曲，则以其艺术上的创造性、内容上的现实性，成为元代文学艺术的代表。

展阅史卷，大都一代之兴，必有一代绝艺称于后世，如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及元之曲，亦开气数音律之盛。

作如是观，日出日没处“都是咱每的”元朝，不仅在马背上奠定了辽阔疆域，同时，下了马背，也以宽宏气势建构了堪与这个强盛帝国匹配的封建文化。

理学的发轫为官学，元曲的“天马脱羁”^①而绰立文苑，是为一证。

先进与落后：迷失在黎明之时

在社会发展链条上，蒙元在跨越一次社会形态之后，能否继续向下一社会形态进发？

中年马克思表达过一个关于一种社会形态容纳的相关生产力，在没有被全部发挥出来之前，这个社会形态就不会灭亡的观点。^②但晚年马克思在对俄国有了一定考察后，又作出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俄国，也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③列宁则将马克思晚年设想，发展成社会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④并予实现。

同理反复，既然在自然经济环境中，蒙元可以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物质条件发展不充分的俄国，又能率先进入高一层次的社会形态，那么，至少在理论上，封建主义性质的元朝立国之后，继续开步向资本主义方向过渡，是完全成立的。

问题是，对这个理论上站立得了的历史现象进行探讨，我们将从何契入？

恩格斯提示过一条路径，他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寻找。^⑤

要之，元代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发生了什么变更？它所处时代的经济学又是什么？

显然，这些问题的提出，首先促使我们回顾宋代。因为蒙元挟宋代先进文明前行。^⑥

宋代，在中国，是个激而横决的王朝。就生产方式论，它至少在以下四个行业中出现有别于以往封建生产方式的新因素：

一，农业中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如四川“园户”石光义等“各为雇召人工”

^① 《说郛》卷 84《词品》，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880 页。

^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9 页。

^③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二稿、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30 页。

^④ 参见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67 页）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8 页）。

^⑤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28 页。

^⑥ 元杨维桢曾著《正统辨》，以为“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乾隆阅后说“持论颇正”。详见《东维子集·圣谕》，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221 页。

之事，不仅一般地反映茶园中雇佣劳动的普遍存在，同时有“每日雇钱六十文，并口食在外”的报酬，以及投入产出明细帐和“茶货投场”后“逐时市价”等的记录。^①

二，丝织业中出现控制生产的商人资本。曾迁台州知州事的唐仲友，在“私家婺州所开彩帛铺”，既作贩卖，又“雕造花板”，“在宅堂及公库”，“充染帛用”。这是商人兼营作坊或手工工场，即商业资本控制生产的例证。^②

三，四川盐业中反映雇主与雇工间的关系平等。据文同称，盐井经营者每户雇工二三十至四五十人不等，雇主按月支付“佣身赁力”的雇工“工直”。雇工不出卖人身。雇用期间，雇工若对雇主“一不如意”，便群起“算索工直，偃蹇求去”。“偃蹇”，即骄横、傲慢意。“佣身”在“井户”面前骄横、傲慢，“主人”却“但务姑息”，“无术可制”，^③这是前所未有的。

四，矿冶业中无产者队伍的存在。徐州利国监有冶户三十六，户户“藏镪巨万”。他们的生产规模相当可观，每冶雇工数，悉在“百余人”。而这些被雇者则尽皆“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也。”^④他们是一群除了劳动力之外，别无所有的无产者。

很明显，这些新因素，在宋之前，纵然寻它千百度，也难觅见真切处。它所具有的水平，不高于十四、五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再看交换方式。自先秦以来，城市基本模式是严密封闭的街区结构。以唐代长安为例，城垣内若干纵横大街切割出百来个块状住宅区——坊，两个商业区——市，坊市四周筑起近3米高围墙将各自封闭。坊建四门，白天开放，黄昏关闭。大街两旁没有商店，唯三品以上高官府第有资格“向街开门”。^⑤在这里，市场被画地为牢，商业活动关山阻隔。

但自北宋中叶开始，坊墙纷纷倒塌，^⑥商业区与住宅区的界限逐渐消失。京城开封以“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的魅力，“惊人耳目”；又以“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的气象，“张人精神”。^⑦从此，城市通衢街巷，几乎皆成市场。商业资本在国内市场取得了真正自由的活动权力。预买与赊卖，这种较高级的商业经营方式随之普遍。^⑧善于丹青的精英，此刻也

^① 《净德集》卷1《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事状》，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8页。

^② 《晦庵集》卷18《按唐仲友第三状》，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3页。

^③ 《丹渊集》卷34《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6页。

^④ 《宋文鉴》卷55《奏疏·徐州上皇帝书》，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50页。

^⑤ 《唐会要》卷86《街巷》，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07页。

^⑥ 李剑农对宋代坊墙制度的圯废有详尽论说，文载《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1页。但坊墙倒塌是个渐变过程，它应开始于唐代后期。详见《唐会要》卷86《街巷》目“贞元四年”条，第291页。

^⑦ 《东京梦华录·自序》，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89—126页。

^⑧ 如苏轼就曾说过：“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见《东坡全集》卷51《上皇帝书》，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7—709页。

将笔触集聚到表现市集与贸易上，^①文人创作的山水画则呈现一种对自然界忠实模拟的写实主义。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当中国的宋代，那里依然是盛行宗教艺术之时。

市场的扩大，不仅激励人们积极入世精神，挥别小国寡民观念，又“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②同时也促使社会契约关系普遍化，所谓民遇“典买”、欺蒙等纠纷，“比至到官，惟凭契约”。^③此外，因应货币形势发展，在宋代又导致“交子”^④的诞生。它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的纸币。

至于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则主要聚焦在对“利”的鼓与呼。

战国时期，自孟子对梁惠王说了“王何必曰利”，若“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的话，^⑤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⑥的义利观，遂被推向极致。以后的社会风尚，庶几被演绎成不屑谈论功利。

但入宋以来，大江而南的著名学者李觏却疾呼：“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⑦文学家苏洵附和李觏观点，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⑧接着，与朱熹进行“人欲”^⑨“义利”^⑩之辩三年的陈亮，更明确表示：“人生不能无欲”。^⑪他说：“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为哉！”^⑫另一位永嘉学派健将叶适，则直斥“仁人”的“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之辞，是“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⑬他主张“成其利，致其义”。^⑭就是说，“利”不仅与“义”不矛盾，而且是“义”的基础。

宋代知识人敢如此反传统地为“利”大事鼓噪，其实并非无张本。考察当时社会，“利”之直接受益者——“富民”，已发生大变化。它的概念由传统的地主与商人二结合，一变为增添了“富工”这个新内容的三结合。借王安石话说，就是“大农，富工，豪贾”。而所谓“富工”，即指自由手工业中的作坊主，这些“富工”的富裕程度，足可“与通邑大都之有力者争无穷之侈”。^⑮这是一个新兴社会阶层，由他们作新鲜血液注入“富民”群体，明显使为“利”辩护的思想家所依靠的政治力量，强于以往。

^①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表达的内容，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②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5页。

^③ 《止斋集》卷44《桂阳军劝农文》，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0页。

^④ 《隆平集》卷3《爱民》，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71页。

^⑤ 《孟子集注》卷1《梁惠王章句上》，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7页。

^⑥ 《论语集注》卷2《仁里》，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7页。

^⑦ 《盱江集》卷29《原文》，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5页。

^⑧ 《嘉祐集》卷9《利者义之和论》，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4页。

^⑨ 《晦庵集》卷36《答陈同甫》，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4页。

^⑩ 《龙川集》卷20《又甲辰答书》，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1页。

^⑪ 《龙川集》卷25《祭李从仲母夫人文》，第1171页。

^⑫ 《龙川集》卷11《四弊》，第1171页。

^⑬ 《习学记言》卷23《汉书·传》，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49页。

^⑭ 《习学记言》卷21《汉书·帝纪》，第849页。

^⑮ 《临川文集》卷83《抚州通判厅见山阁记》，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5页。

综上所述，在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以及有关时代的经济学等三方面，宋代在中国都是有所开端的王朝，尤其商人资本活动，为以往任何时期不能比拟。经商者有资财三、五万缗乃至三、五十万缗以上的，^①不是罕见。官吏“不耻贾贩”^②的现象，也成为常态。

经典理论认为，“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③宋朝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历史前提”的朝代。它不仅对于中国如此，同时又具世界意义。^④所以，审读人类历史，宋代不愧是引唱世界近代化的报晓金鸡。

元代上承宋代破竹之势，但比宋代又有进步。特别在重商和钞币两个方面成就独特。

当然，宋代在这两点上表现亦空前。然而与元代比较，一、重商思想毕竟不居支配地位；二、货币没有以世界货币——白银作价值尺度，且发行的纸币，原则上始终是兑换纸币。这样就遏制了重商思潮在宋代发展成重商主义。而重商主义“在封建生产的最早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⑤

元代不同，由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三月，元世祖忽必烈“更行至元宝钞”，^⑥正式发行了不兑换纸币，实行世界货币史上最早的纯纸币流通制度，货币因此淡去了它所具有的特殊商品功能，^⑦从而大大净化流通手段，便利了商人资本在辽阔地域周流。商业在元代因此取得比宋代更大发展。关于它的盛况，仅举两条史料便足资证。

一，“言动必揆诸义而后发”^⑧的朱熹私淑弟子许衡，一旦惜别皇宋而置身重商思想弥漫的元朝，对知识人的经商行为，竟也主动给予辩护。他说：

治生者，农工商贾而已。士子多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⑨

二，至元二十五年（1288）十一月，元政府对向来耻于言利的经商、务农等走实务道路的知识人，实施优惠政策。文曰：

皇帝圣旨：据尚书省奏，江淮等处秀才乞免杂泛差役事。准奏。今后在籍秀才做买卖纳商税，种田纳地税，其余一切杂泛差役并行蠲免。所在官司常切存恤，仍禁约

^① 《景文集》卷28《乞损豪强优力农札子》，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8页。

^② 《范文正奏议》卷上《荅手诏条陈十事》，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27页。

^③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5页。

^④ 以西欧为例。当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灭亡，欧洲奴隶社会方告终结，而此时中国早就经历封建时代的一个文明高峰期——西汉的“文景之治”。公元800年，法兰克人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崛起“查理曼帝国”，促成西欧文明诞生，但中国此时已告别盛唐。即使进入十一、二世纪，西欧仍在黑暗中世纪徘徊，而宋代则在当时堪称世界文明高峰。因此对于中国，宋代是空前的，对于世界，宋代同样是黎明曙色。

^⑤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6页。

^⑥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元·钞》，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26页。

^⑦ 《资本论》第1卷，第108页。

^⑧ 《元史》卷158《许衡传》，第295页。

^⑨ 《鲁斋遗书》卷13《国学事迹》，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8页。

使臣人等，毋得于庙学安下非理搔扰。准此。^①

由此可见，元代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发，本不是理论问题，而应考察它步子开了多大？

通常，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有两条途径。一、抛弃了封建生产方式的生产者成为商人和资本家，“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二、商人直接支配生产，但这条途径在历史上尽管起过巨大的过渡作用，却只是在旧生产方式基础上占有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劳动，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发展而被消灭。^②

遗憾的是，商人资本很发达的元朝，最终既没走上激发古老资本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真正革命化的道路”，也没跻身于商人直接支配生产的途径。它在世界黎明时刻迷失了方向。

那么，个中原因安在？时任集贤大学士、又有家僮“数百趾”以“治其田”^③的许有壬，有段至今读之仍耐人寻味的话，他说：

我元始征西北诸国而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国人柄用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然而求其善变者，则无几也。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国俗是泥也。……俗之不同，理之顿异。^④

这就是讲，曾经由商人积极参预王朝统治的元代，在商人谋得巨大利益后，对日益膨大的商人资本，无论是政府还是商人资本占有者本人，都没有适应比任何一种资本更容易改变自己用途和职能的商人资本^⑤之“善变”本性，从而开辟一升新天地，却将赢来之利，或置买田产，循入“以末致财，用本守之”^⑥的传统理财路。

呜呼！先进与落后的互变，就此湘漓分派。

养民焉逸民焉：对民本思想的思辩

对地产的占有欲，是生活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人们特有的定势性思维。即使在重商气氛浓烈，官私手工业长足发展，科学技术大进步的元代，亦然。如金陵王氏，宋时“勤俭殖生”而“致丰裕”，入元后“增益其田数十顷”。^⑦再如为元朝主持海运的朱清、张瑄，一经成为势倾朝野的新贵，便对江淮之间田园屋宅大肆搜买，乃至田宅“遍吴中”。^⑧

何故人适重商新元朝，经济活动却依旧青睐田产交易旧桃符？究其原因大体有三。

^① 《昌国州图志》卷2《叙州·学校》，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91页。

^② 《资本论》第3卷，第373页。

^③ 《至正集》卷11《僮屋为大雨所仆歌》，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11页。

^④ 《至正集》卷53《碑志·西域使者哈扎哈津碑》，第1211页。

^⑤ 《资本论》第3卷，第314页。

^⑥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44页。

^⑦ 《吴文正集》卷76《故金陵逸士寅叔王君墓碣铭》，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7页。

^⑧ 《姑苏志》卷60《杂事》，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93页。

一、“千年田换八百主”^①的时势，为商人资本持有者提供了心理上的避风港。

王祯有一说，语言虽朴实却值得今人重视。原文如次：

谚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纹不如倚市门。”此说一兴，天下之民，男子弃耒耜而争贩鬻，妇人舍机杼而习歌舞，惰游未作习以成俗。一遇凶饥，食不足以充其口腹，衣不足以蔽其身体，怀金形鹄立以待尽者，比比皆是。^②

这里，王祯已于不经意中涉及一个流通过程中，商人资本“不生产任何价值，因而也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③的现代经济学学说。这个学说诠释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为何热衷“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因为末业尽管能快速积累货币，但这些“不生产任何价值”的货币在古人看来不实在，所谓“一遇凶饥”，“怀金形鹄立以待尽者，比比皆是。”而元代沿袭宋朝的“田制不立”，^④“不抑兼并”^⑤政策，土地自由买卖闸门高启，这就为“鹄立”的商人资本向地产转移提供宽广空间。因此将货币投入地产，一定程度释放了富者心理压力。所以元代浙西出现有田“二千七百顷”的“多田翁”瞿廷发^⑥之类，便不足奇。

二、土地产出已有广阔市场，从而哺养以地产形式出现的物化资本。

资本的目的是生产利润。^⑦没有利润，资本就失去生命。因此流向地产的资本不会守株待兔。元初建德路总管方回对农民家计所做考察证明，投入地产的资本，产出颇可观。他说：

予往在秀之魏塘王文政家，望吴依之野，茅屋炊烟，无穷无极，皆佃户也。一农可耕今田三十亩，假如亩收米三石或二石，姑以二石为中，亩以一石还主家，庄斡量石五。以上且日纳主三十石，佃户自得三十石。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一年食十八石，有十二石之余。予见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棹钱复买物货归售。^⑧

这份明细账反映，运营地产的资本回报率（毛利）是产出的50%。可见利润不菲。值得重视的是，佃农在贡献50%地租后，生活亦不见贫，甚有机灵者乘收获季节，还能利用地区差价做一拨贩运贸易。之所以出现如此良性局面，应该跟粮食在元朝成为大宗商品相关。

^① 《稼轩词》卷2《最高楼》之八，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88页。又《紫山大全集》卷23《杂著·折狱杂条》，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6页。

^② 《王氏农书》卷4《农桑通诀·劝助篇》，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30页。

^③ 《资本论》第3卷，第311页。

^④ 《日知录》卷10《地亩大小》第858页。

^⑤ 《历代兵制》卷8《本朝》，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63页。

^⑥ 《山居新话》卷4，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40页。

^⑦ 《资本论》第3卷，第285页。

^⑧ 《续古今考》卷18《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53页。

王祯说，江浙、湖广等地以“余羨”许牙商“贩入外江船”，“补添他郡食”。^①而据有关记载，每年经河、海漕运大都等北地的粮食，多时竟达五百万石左右，^②以至北方粮价受制于漕粮，所谓“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③这种价格波动，正从一个侧面折射土地产出（包括棉、桑、麻、茶等）具有广阔市场，而市场则哺养以地产形式出现的物化资本。

三、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土地得到相应产出的保证。

土地产出好坏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自然灾变，克服灾变，探索作物生产高新技术，是保证物产数量和质量的重要因素。元人深谙此道，所以十分注重总结和普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如由专管农桑水利的司农司负责编写《农桑辑要》时，考虑田里之人，虽能勤身从事，而播殖之宜，蚕缲之节，或未得其术，则力劳而工寡，获约而不丰，“于是偏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披阅参考，删其繁重，摭其切要，纂成一书”，镂为版本，颁布天下^④即为例证。

由于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广为传播，以水稻单产为例，元代江浙地区上田可达五至六石，中田三至四石，下田二至三石。这个产量，在水灾频繁的江南地区若没有先进生产技术支撑，显然不可能实现。

这样，既有生产技术支撑土地产出，又有市场将产出转化为商品，因而，流向地产的资本就不纯粹是释放商人资本持有者心理上的压力，它的回报率亦可观，从而强化“以未致财，用本守之”观念。于是，得到生产技术支撑的土地产出加市场，再加商人资本持有者转移资本后得到的实惠，使本在经受准市场经济状态冲击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复具强大再生力。

但是自宋元以来，社会内部毕竟出现了新经济因素，它或慢或快，终将引起经济基础的变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⑤

然而，“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⑥它生成的消极影响不仅指“以未致财，用本守之”观对元代的进步已形成巨大阻力。更指来自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惰性力。

“民本”，是中国一古老的统治思想。最初对它给予逻辑说明的是被称作《书经》的《尚书》。其中《五子之歌》首篇将其概括为两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⑦

^① 《王氏农书》卷11《农器图谱·田制门·围田》，第730页。

^② 《资治通鉴后编》卷162“大德十一年冬十月丙辰”条载：“中书省奏：常岁海漕粮四百十五万石。”（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45—236页。）若包括河漕粮，多时，应在五百万石左右。

^③ 《通制条格》卷27《杂令·拘滞车船》，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88页。

^④ 《农桑辑要·原序》，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30页。

^⑤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页。

^⑥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0页。

^⑦ 《尚书注疏》卷6《五子之歌·其一》，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4页。

值此一提，所谓民本，并非突出体现了商周时代“政治生活中的原始民主制色彩”。^① 它是对天命论的撷英，是前资本主义时期，中国集权政治的理论根基。

《尚书》说：“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② 又说：“有夏服（受）天命。”^③ 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既恶（夏）桀而欲与之皆亡，则是天绝之矣。”^④

这些古人字句清楚传递一个信息：天下黎民都是天的儿子，谓之子民。子民各生欲念而相互攘夺，社会秩序因此纷乱。于是上天降命天子，由他统率子民，教化他们清心寡欲。《左传》所谓“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⑤ 就是这层意思。后人所讲“天有爱民之心，而司政典狱者实代天以养民”，^⑥ 与《左传》同理。但天子非超人，他也会失范，如私欲横流的太康就“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⑦ 这时天见子民衣衫蓝缕，闻子民怨声载道，遂降天灾于人间，^⑧ 警示天子匡过。弗听，子民揭竿，打倒昏君，再立“新君”，以为“正始”。^⑨ 所以《诗》有“天命靡常”^⑩ 一句。

因而，据此可知，所谓民本思想，实以阉割社会个体独立意志为政治取向，让黎民似羊群般接受天子牧养的家长制统治术。而被牧之民则因泯灭了自身独立人格遂顶礼膜拜虚幻中的神灵，祈神灵通达上苍，将“善政”、“养民”¹¹ 的“明君”¹² 常住人间。

当然，以天子践“天命”论，善政养民之首务是对土地的关怀，所谓：“理民之道，地著为本”。¹³ 这个执政纲领，即使到了泛露世界近代化曙色的宋代仍是圭臬，宋人在解释舜置十二州设十二牧的意蕴时就强调“养民”的“急务”是土地及产出。¹⁴ 但千百年间，首对民本与土地两者关系言简意赅给出透彻说明，却是元世祖忽必烈。他在开国之初指出：

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¹⁵

是故，因为理论彻底而“说服人”^⑪ 的以土地养民之民本思想，顺理成章与“以末致财，

^① 林甘泉：《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及其历史价值》，载《光明日报》2003年10月28日。

^② 《尚书注疏》卷7《商书·仲虺之诰》，第54页。

^③ 《尚书注疏》卷14《周书·召诰》，第54页。

^④ 《尚书全解》卷14《汤誓》，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5页。

^⑤ 《春秋左传注疏》卷32《襄公十四年》，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3页。

^⑥ 《陈氏尚书详解》卷47《周书·吕刑》，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9页。

^⑦ 《尚书注疏》卷6《五子之歌·其二》，第549页。疏：“迷乱曰荒”。言沉溺女色，驰骋田猎到了发狂地步。

^⑧ 《尚书》说：上天降灾，“以彰厥罪”。（《尚书注疏》卷7《商书·汤诰》，第54页。）

^⑨ 《夏氏尚书详解》卷17《武成》，广雅书局刊武英殿聚珍版，第6页。

^⑩ 《毛诗注疏》卷23《大雅·文王之什》，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9页。

¹¹ 《尚书全解》卷4《大禹谟》，第55页。

¹² 《尚书注疏》卷7《商书·伊训》，第54页。

¹³ 《前汉书》卷24《食货志》，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49页。

¹⁴ 如陆氏学派的陈经即强调“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十二牧之职在于养民，养民之急务莫先于食。”（《陈氏尚书详解》卷2《虞书·舜典》，第59—25页。）史臣陈靖亦向皇上进言：“（今之）欲生其民丰其食者，莫大于积谷而劝农也。农田之兴，教化攸重。”（《宋名臣奏议》卷105《上太宗乞从京东西起首劝课》，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32页。）

¹⁵ 《元史》卷93《食货志·农桑》，第293页。

用本守之”观念磨合并演化成元朝的统治思想。

其实，就传统阻力和惰性力言，向有经济的、政治的两个面。“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及在这个观念下形成的经济力，是经济面；以“养民”为宗旨的民本思想，则是政治面。两种面的阻遏力，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代表”，^②所以政治面所产生的影响比较于经济面，来得深些、广些、持久些。

但问题在，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民既被养而鲜有不逸者。有事例可作资证：

唐太宗、高宗时期的著名宰相许敬宗在朝廷喋喋不休武才人能不能被册封皇后时，曾对高宗私下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田舍翁积得十斛麦尚欲换却旧老妇，况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关诸人何事，妄生异议！^③

唐代容量一斛当一百升。成人通常日食一升，一年需 3.6 斛。以夫妻两口计，十斛约当一年多点的口粮。中唐之前“大河（黄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原”^④；南北朝时“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⑤的长江下游流域，在唐代更成为“军国费用”所“取资”^⑥的重地。因此，许敬宗所称“田舍翁”在主要经济区的正常年景，积累一年余粮不会是件艰难事。然而就这么一点积余，却能撩起人们喜新厌旧色欲，可见淫逸习气在于人，根深蒂固。

告子曾说：“食色性也”。孟子不以为然而诘之，指出人有“仁义礼智”之心，“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得之”，足可抵御声色犬马诱惑。^⑦

可是，以养民为宗旨的民本思想，追求的是轻徭薄赋和升平舞莲步式的治世，这本身恰是建立在农本经济基础上的安逸生活，它很容易成为淫逸习气的温床，很容易劫走人们的“仁义礼智”之心。因此在追求这种愿景时若没有某种规范的设计，就可能导致淫逸习气社会化，从而酿成灾难性后果。元代的早逝，是这方面惨痛实例。明朝初年，与朱元璋重臣刘基、宋濂齐名的浙西学者叶子奇，在分析一度强盛辉煌的元朝，为什么入主中原仅八十八年即亡国的教训时，就一针见血指出：

元朝自平南宋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佚，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之不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61 页。

^②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79 页。

^③ 《唐会要》卷 3《皇后》，第 606—16~17 页。

^④ 《册府元龟》卷 487《赋税·开元二十五年九月诏》，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910 页。

^⑤ 《宋书》卷 54《列传》，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258 页。

^⑥ 《文苑英华》卷 422《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337 页。

^⑦ 《孟子注疏》卷 11《告子章句》，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95 页。

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及乎天下之变，孰能为国爪牙哉！此元之所以卒于不振也。

本来，穿越了千重山万道水的中国古老的商人资本，到了元朝，犹如飞流直下三千尺，成为充满溃决封建主义堤坝之希望的强大推动力。但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观念及其实践，对汹涌直下的“飞流”围起一道封堵圈；以土养民的民本思想则在广义上又使形成这股推动力的形形色色的“民”，趋向淫逸，以至与本该励精图治而有作为的历史机遇期，失之交臂。

彼一时，纣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而断送了商朝；此一时，骄奢淫逸风气弥漫社会，飞觞、酒令，肉阵、讴歌，代之常备不懈的“兵政”致使强势元朝快速灭亡。历史之相似，竟如此惊人。

痛哉！强盛元朝，逝去流速。

^① 叶子奇：《草木子》卷3上《克谨篇》，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6页。